

外国文学论丛

王守仁 许钧 主编



20世纪法国

20 SHI JI FA GUO FAN WEN XUE YAN JIU

“反文学”研究

刘成富 著

65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外国文学论丛

王守仁 许钧 主编



20世纪法国

20 SHI JI FA GUO FAN WEN XUE YAN JIU

“反文学”研究

刘成富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法国“反文学”研究/刘成富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 10
(外国文学论丛)
ISBN 7-5399-1843-8

I .2... II .刘...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法国
IV .I565.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5746 号

书 名 20 世纪法国“反文学”研究
著 者 刘成富
责任编辑 剑 冰
责任校对 方 泰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2 万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843-8/I·1744
定 价 1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外国文学论丛总序

在中国,自20世纪初的“新文学”运动以来,外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一直伴随着中国文学的生命历程。王蒙曾这样论述外国文学与民族文学的互动关系:“翻译文学的发达与本身创作的繁荣密不可分。通过翻译,外国文学进入本国的精神生活,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活跃因素。”就我们的理解,外国文学要进入本国的精神生活,对本国文学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一要通过译介,二要通过研究。前者是通过翻译家的劳动,根据所在国民族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需要,将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介绍过来,后者则要通过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独物眼光,对外国文学及文学理论或进行史的梳理,或对流派加以研究,或对具体作家和作品进行诠释与评介。这两项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构成了我们对外国文学与文化接受的两个不可缺少的过程。

多年来,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师结合教学需要,在外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译介绍了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德语文学、俄语文学和日语文学的大量优秀作品,同时承担了多项国家、教育部和江苏省人文社科研究课题,在外国国别文学史、外国作家、作品与流派研究、外国文学批评理论等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了推进与深化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使外国文学研究成果对我国的文学发展和文化

建设真正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我们在南京大学和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组织了这套开放性的《外国文学论丛》,适时推出我院教师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探索成果。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得到国内同行与读者的认同、帮助与指正。

王守仁 许钧

2002年4月2日

目 录

导论：“写作零度”的时代

- 法国作家对自杀性写作结构的追求…………… (1)

第一章 心理描写与“主观真实”论

- 意识流小说大师马塞尔·普鲁斯特…………… (13)

第二章 梦境与现实之间的连通

- 超现实主义领袖安德烈·布勒东…………… (34)

第三章 试图推翻作品中心论的人

- “理智的疯子”安托南·阿尔托…………… (52)

第四章 文学与哲学结合的典范

- 敢闯禁区的乔治·巴塔耶…………… (67)

第五章 从虚幻的感觉中寻求精神解脱

- 生活在“人造天堂”里的亨利·米肖…………… (78)

第六章 客观细腻的静物写生与“世界漂浮论”

- “新小说”领袖阿兰·罗布-格里耶…………… (94)

第七章 文学作品成了“拼贴画”

- 不断寻求创作立体感的克洛德·西蒙…………… (108)

第八章 “潜对白”开创了心理描写的新天地

- 敢于挑战普鲁斯特的娜塔丽·萨罗特…………… (126)

第九章 音响效果、造型艺术与全新的时空观

——“百科全书”式的作家米歇尔·布托	(141)
第十章 不是现实主义,胜似现实主义	
——荒诞派戏剧大师欧仁·尤奈斯库	(156)
第十一章 身残志残的人物意味着人间地狱	
——否定了人的存在的萨缪尔·贝克特	(172)
第十二章 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与“写作零度”	
——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	(186)
第十三章 从“反文学”理论到“反文学”实践	
——过于强调文学形式的克洛德·莫里亚克	(201)
第十四章 “文本写作”与创作风格上的波动	
——原样派领袖菲利普·索莱尔斯	(218)
第十五章 破译了词与物的关系	
——后结构主义大师米歇尔·福柯	(228)
第十六章 “文字学”与多元文化思想的构建	
——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	(239)
结语:意义先于信息	(252)
参考文献	(265)
后 记	(271)

导论：“写作零度”的时代

——法国作家对自杀性写作结构的追求

刚刚告别我们的 20 世纪，是一个充满各种危机的世纪，一个社会结构多元化发展的世纪，一个信息科学突飞猛进的世纪，一个思维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纪，一个既闪烁睿智的智慧之光又显示绝顶野蛮之力的世纪。血腥残酷的战争和如火如荼的革命，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对立与较量，构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时代背景。在佳作纷呈、流派林立的法国文坛，从达达派到荒诞派戏剧，从现代派到后现代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几乎没有一个理论，没有一个思潮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狂潮，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态也出现了严重的裂变和失衡，一个充满迷惘的“怀疑的时代”出现了。在这个充满精神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的时代，法国作家似乎更为认同帕斯卡尔的悲观结论：“人是怎样的虚幻啊！是怎样的奇特、怎样的怪异、怎样的混乱、怎样的一个矛盾主体、怎样的奇观啊！既是一切事物的审判官，又是地上的蠢材；既是真理的储藏所，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薮；是宇宙的光荣而兼垃圾。”

应该承认，“人论”的变异使 20 世纪的法国文学走向了层次更深的人性挖掘，尤其使其创作主题和写作风格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说，19 世纪的法国文学，在实证主义、意志主义等思潮的

影响下,形成了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创作风格,那么,20 世纪的法国文学则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冲击下,形成了一个对传统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和写作风格进行彻底否定的新型文学——“反文学”。这种具有“先锋精神”的写作风格,这种具有自杀结构的、对传统文学进行彻底破坏的“反文学”的出现,其实不是法国作家们想标新立异,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是传统文学发展到 20 世纪的必然趋势。克洛德·莫里亚克(Claude Mauriac 1914 -)说:“反文学,也就是从平板拘谨的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文学,它被这种传统赋予了一种贬义,它是永远也无人可以达到的极端,是自人类有了写作活动以来,所有诚实的人奔赴的一种方向。”这种具有叛逆精神的文学,不仅深刻地反映了法国作家们的文学和文化意识,而且反映了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文化心理意识,它全面地揭开了一层笼罩在文学上的面纱,深刻揭示了小说“文字游戏”的特点和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巨大“能指性”。毋庸讳言,“反文学”实际上是现代主义、现代派、先锋派的代名词。我们用“反文学”来概括 20 世纪法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旨在强调它的反传统、反理性、反权威、反成规的特性,突出一个“反”的概念,尤其是写作风格上反传统的概念。

追根溯源,19 世纪出现的象征主义为法国 20 世纪“反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20 世纪法国“反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它对传统的审美意识和创作手法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否定。在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 - 1860)的唯心历史观的影响下,法国资产阶级的文化危机日趋严重,许多思想家和作家都不愿科学地认识眼前的现实,他们常常迷恋于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法国唯灵主义哲学家伯格森(Henri Bergson, 1859 - 1941)认为,人只有凭直觉才能够接近于认

识真理。19世纪末产生于法国诗坛的象征主义,在这种审美意识的指导下很快就扩大到了其他文学体裁。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 – 1899)认为,现实世界的具体对象以及它们的个体多样性,仅仅是彼岸思想的贫乏而歪曲的反映,或者说,是它们的影子、符号和象征。他否定了理智的意义,盲目崇拜直觉,认为人通过现实生活的“象征现象”即直觉就可以接近理想和永恒。马拉美的世界观是基于各种唯心主义哲学理论的折中主义的混合物,因此,他的诗描写的即使是普通的日常事物,也总是包含有唯心主义的潜台词,有一种将具体事物转化为抽象概念的倾向。象征派的审美原则和艺术手法,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诗学盲目地崇拜那些暗示某种晦涩的神秘作品。简单地说,他们要影响的不是读者的理智,而是读者的直觉,他们常常重形式甚于内容,如,兰波(Arthur Rimbaud, 1854 – 1891)在他著名的十四行诗《母音字母》(Les voyelles)里,把单词分成许多音节,而且力图证明每一个单独的母音都代表着一种颜色。他通过这种写作方式为读者创造出了鲜艳夺目的印象,缓慢的旋律和伤感的语气深刻表现出了诗人的痛苦和忧伤:人不过是命运的玩物,死神无处不在。他的诗摆脱了单调的“段”的局限,摒弃了古典的写诗方法,采用变幻不定的自由体,这种新的写诗风格让我们看到了“反文学”风格的雏形。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 – 1922)是作为颓废心理的“意识流”小说创作者登上法国文坛的。他生活在资产阶级的贵族沙龙里,温室般的悠闲环境使他脱离了骚动不安的外部世界。在他的七卷本的超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里,普鲁斯特描写了主人公一系列漫长的回忆、追忆和联想,非理性的“意识流”成了作者用以表现主人公抗拒现实的一种奇特的方法。通过这种反传统的写作手法,普鲁斯特让时空交错,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融合在一起,为读者成功地打开了千百年来未

曾见过的新天地,即人的内心世界、潜意识和心理积淀等另一个天地。在普鲁斯特的笔下,对“自我”、“本我”以及“主观真实”的寻求,最终取代了巴尔扎克小说里对资产阶级丑恶本质的揭露。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消失了,故事情节消失了,叙述的线索变得零乱不堪。普鲁斯特对“心理时间”的巧妙运用,使各种场景交织、穿插、汇集到“现在”,使得他的作品产生了一种传统小说不曾具有的艺术效果。普鲁斯特的写作风格,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法国的“反文学”作家。

超现实主义,是法国 20 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文学》杂志周围一些思想激进的“左派”文学青年所倡导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它的前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达达主义。在文学创作上,达达主义者常常把一些莫名其妙的单词组合在一起,对混杂零乱、无所用心的感觉不作任何说明地进行描述。达达派诗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 1896 - 1966)与特里斯丹·查拉(Tristan Tzara, 1896 - 1963)在这一流派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后来,布勒东与达达主义的决裂导致了超现实主义的诞生。超现实主义坚持艺术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原则,抛弃了达达主义原始幼稚的原则,通过出人意料的联想和梦幻使得文学作品里的艺术形象更为复杂。这种不合逻辑的联想和梦幻,成了超现实主义最明显的艺术胎记。从艺术表现手法的角度来看,超现实主义者深受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影响,他们在诗中排除标点符号,强调意识流的不停顿性和不间断性。这种创作方法打破了传统的诗歌创作方法,而且用音响的搭配弥补了缺乏准确的旋律和韵脚的不足。在他们的笔下,“无意识的创作”和对梦幻记叙产生了神奇的艺术效果,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抗拒和对传统形式的摒弃,他们生动地表达了精神上的空虚和无政府主义的反抗情绪。这种“左”的革新,带有明显的形式主义色彩,从很大程度上扼杀了诗歌逻辑、思想和内容,但同时也是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在超现实主义诗歌和戏剧方

面,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 1896 - 1948)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残酷的戏剧”的理论和实践中,通过对导演和译者主动权的深刻论述,阿尔托为我们彻底地否定了作者和文本的权威,使文本的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以及“读者中心论”的概念,深深地影响了法国 20 世纪的剧作家和作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 - 1962)的作品的“色情描写”和阐释的“下唯物主义”哲学概念在文学界和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然而,他的思想里处处闪烁着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伯格森、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师的思想光芒。亨利·米肖(Henry Michaux, 1899 - 1984)也是一位与超现实主义十分接近的诗人,他在作品里为我们描写了无数奇特无比的幻景,他的诗具有丰富的想像力,通俗、粗野、猥亵的“革新”语言使得他的诗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驱魔力量。

存在主义早在 30 年代就出现了,虽然在写作风格上没有十分引人注目的表现,但是其反叛的艺术思想却对“反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把贯穿现代主义历史的“荒诞”主题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法国的思想艺术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荒诞感已从一般的历史社会范畴,从一种批判意识发展成为一种彻悟的意识。存在主义的根本宗旨是专门强调生活的肮脏与虚无,萨特(Jean Paul Sartre, 1905 - 1980)是这一文学 - 哲学流派的理论家和创始人,他的《存在与虚无》和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1908 -)的《文学与形而上学》,为我们深刻地阐述了存在主义的思想原理,仿佛每个人,无论他有多大的年龄以及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都是残酷和无耻的,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地伤害别人。他们彻底否定了生活的意义,在杂乱无章的物质世界中,他们既看不见其他东西,仿佛自相矛盾、互不协调、支离破碎就是人类本质形成的基础,在他们的眼里,世界的本身就是荒诞。存在主义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加缪(Albert Camus, 1913 - 1960),在《局外人》和《西齐夫神话》等重要的作品里,也为我们生

动地表现了人们对这种荒诞的世界和荒诞的人生所进行的种种抗争。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新小说”开始占领法国文坛并使“反文学”创作达到了高潮。“新小说”产生的基本原因是:作家们希望通过小说的写作技巧来适应迅速变化的世界。“新小说”不是一个具有自己的原则、自己的信条和自己的美学观的学派,而是一群作家在写作技巧、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烦恼方面有着共同的、深入的、新颖的见解。例如,在阿兰·罗布-格里耶(Alain Robbe - Grillet, 1922 -)、米歇尔·布托(Michel Butor, 1926 -)、娜塔丽·萨罗特(Nathalie Sarraute, 1902 - 1999)、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 1913 -)、马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1914 - 1996)、克洛德·莫里亚克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的技巧和理论标准。阿兰·罗布-格里耶倾向于纯描写性的文学,他的作品一般总是给人一个总的印象和总的感觉;米歇尔·布托用一种接近音乐的创作方法,通过把人物的思想、感觉、言语和内心独白糅合在一起,巧妙地表现它们共有的现实性;娜塔丽·萨罗特用精神分析家的方法挖掘了人物的意识状态,尤其是内心独白的前奏——潜对白;克洛德·西蒙通过那些没完没了的句子,使作品中人物的意识状态变得混乱不堪,他的作品堪称是一幅幅名副其实的拼贴画;而马格丽特·杜拉斯的新小说则缺乏确定的主题和真实的情节。“新小说”的出现对法国的文学发展走向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一些文坛老将。克洛德·莫里亚克在写小说的时候,总是把故事素材混杂在一起,通过打乱时间的顺序给读者以一种全新的价值观。总而言之,“新小说”要人们能更好地理解时间、事物以及与之相关的人。

几乎就在“新小说”出现的同时,荒诞派戏剧也诞生了。荒诞派戏剧的思想基础是存在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它是一种反传统戏剧,但不像存在主义那样基本上采用传

统的文学形式,而是用反传统艺术方法和戏剧形式来表现荒诞的内容,用破碎的舞台形象来表达不可表达的真实,用延伸的戏剧语言来替代正常的语言。在荒诞派戏剧里,荒诞的主题和荒诞的形式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夸张成了这一流派惯用的表现手法,这种“反文学”的写作风格充分地体现了作家们所意识到的人类处境的荒诞性。在尤奈斯库(Eugène Ionesco, 1912 -)的剧本里,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变成了抽象的公式或空洞的口号,人物对话无不颠三倒四,啰嗦重复,荒诞不经。尤奈斯库试图通过这种非逻辑的思想和密码语言来揭示荒诞的内容,达到一种特殊的深化主题的效果。在《犀牛》里,一个小镇上的人都染上了犀牛病,都变成了犀牛,其主题不言而喻:人失去了自我,异化成了没有人性的动物。在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 -)的《等待戈多》里,作者删除了反反复复的情节和语言以及真真实实的物质主义的世界背景,而将它还原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语言在荒诞派戏剧里失去了传统戏剧语言的作用,变得像“石块和死尸”一般,人与人之间根本无法进行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他试图通过“物”把人物局促不安的心理加以强化,让舞台道具说话,把行动变成视觉的形象。他就是这样试图延伸戏剧语言的,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作品给了读者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因为只有最平淡最平常的日常生活和最乏味的言语被应用到超限时,异常的事物才能够从中涌现。这种戏剧语言不断深化,就其重要性和效果而言,堪与卡夫卡、米肖以及存在主义作家们媲美。以尤奈斯库、贝克特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荒诞戏剧,从艺术的价值来看,虽然是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表现,但它却让作家对理性主义的怀疑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期,它在破坏旧的传统写作风格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先锋角色。它不仅反映了作家们对人类处境的焦虑,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在现实与传统相互冲突的驱使下进行“反文学”探索的雄心和抱负。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原样派”在法国文坛几乎起到了左右

风云的作用,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 1936-)是这个流派里最具影响、最有发展前途的作家之一,他的“反文学”理论为法国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60年,他与其他一些年轻人创办的《原样》(Tel quel)杂志,是二十岁至四十岁之间的所谓“先锋派”进行战斗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阵地。在文学杂志上,许多文章都是文学、哲学、政治和艺术的结合体。几十年来,《原样》(后更名为《无限》)始终注重创新,注重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积极培养了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巴特(Roland Barthe, 1915-1980)、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 1941-)等一批杰出的“反文学”理论家。如,巴特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入手,创立了一个普遍的符号社会学,他的美学思想的发展贯穿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罗兰·巴特善于博采众长,汲取各家之精华,集各派之大成。通过采用当代哲学、生物学和心理分析学的词汇,这位结构主义大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研究了文学和语言学,用符号学的原理对文学以及其他社会文化活动进行了全新思维的分析与探究,为我们揭示了文学与文化以及文学与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德里达通过对文字与言语的关系、文本间性和文学与哲学传统地位的解构,实际上为我们解构了西方亘古如斯的理性哲学。德里达所思考的,通常是西方传统哲学没有思考过的东西,而且是西方传统哲学所不能思考的东西。通过解构的方式,德里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找到了一个用来观照的“非位置”,一个“外在性”的位置,一个非哲学的位置。而且通过对这个“位置”的揭示,德里达为我们开启了一种“相异”的维度,并由此能够对西方传统哲学进行根本质疑。虽然这些“反文学”理论家在具体理论和观点上大相径庭,但都从不同的方面突出了语言的中心地位,主张文学批评应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即研究作品的语言、风格、结构等形式上的特点和功能。他们的理论突破了对单部作品语言技巧分析的局

限,把具体作品文本仅仅看成表面的文学“言语”,即透过文本分析来揭示隐藏于深层的文本总体结构即“语言”或“普遍的语法”。

当然,在现代派文学的对立面,传统的写作风格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文学界理性和反理性之间的斗争始终没有中断。20世纪初,法国涌现了一批反映人民群众情绪的作家,他们继承并发扬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他们所反映的民众对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野蛮暴行的愤怒情绪是自发的,有时是自觉的。法朗士(Anatole France, 1844 - 1924)是个非常富有人情味的作家,他所创造的人物形象至今仍旧脍炙人口。他的小说不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是以对平凡的事物娓娓动听的描述见长,其文笔清晰、自然、优美。他是个幽默大师,善于发现事物的风趣的一面,善于运用灵活多变的讽刺笔调,而他的那种讽刺笔调又含有对人类极大的怜悯心。1907年,他发表的《企鹅岛》指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性,堪称是一部伏尔泰式的讽刺小说。他既保留了古典的传统,同时又怀有乌托邦的理想。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866 - 1944)、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 1885 - 1970)和罗歇·马丹·杜伽尔(Roger Martin du Gard, 1881 - 1958)是法国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与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传统十分接近。在艺术和思想形成的过程中,罗曼·罗兰崇尚现实主义的真实和高尚的道德,懂得艺术应当面向人民的深刻道理。他的现实主义才华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多夫》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罗兰不仅来自人民,接近人民,而且还表现了普通人身上体现的真正的民族精神。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深受基督教观点的影响,即人世间罪恶深重,灾难和痛苦是无法逃避的,他没有把家庭美化为平静安逸的避风港,而是为我们深刻地揭露了深宅大院里的卑鄙勾当。在《母情》里,作者生动地再现了一个滥施威压的母亲形象。这部小说具有强有力的一面,

他所揭示出来的道德上的丑恶现象,与其说是由于生理退化引起的,倒不如说是由于社会造成的,读者能够从他的作品里看到贪婪成性的资产阶级所进行的疯狂争斗。让·吉罗杜(Jean Giraudoux; 1882 - 1944)和纪德(André Gide, 1869 - 1951)也是这一时期法国典型的唯美主义的拥护者。诗人保尔·瓦莱里(Paul Valéry, 1871 - 1945)十分蔑视资产阶级的庸俗生活,他力图以他那特有的主观意识与这一与世隔绝的小天地抗衡,不过,他的艺术追求跟普鲁斯特的有所不同,他希望将法国的抒情诗从象征派诗人手中夺回来,并力图恢复古典诗人和拉辛笔下的那种明快的风格和理性,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诗与当时的颓废主义诗歌不是一回事,其内容是理智的,形式是优美的。以米歇尔·图尔尼埃(Michel Tournier, 1924 -)为代表的“新预言派”的创作形式也遵循了传统的写作风格,他们的作品故事和表现出来的艺术形象,总是蕴涵着深刻的本体论哲理,并闪烁着寓意丰富的灵光。与此同时,法国海外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喊出了讨还血债、拯救失落、寻找归属、寻求自我和告别自卑的呼声,后殖民主义以巨大的声势冲击了法国文坛。与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相比,20 世纪的传统文学虽然在广度和深度上未能超过以往,但至少在力度上有所强化。

再者,在 20 世纪的法国文学中,两种对立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始终没有停止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明显的加强,法国成为国际上的反苏中心,而且在欧洲逐步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法国资产阶级文学的侵略性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亨利·米荣·德·蒙泰朗(Henri Millon de Montelant, 1896 - 1972)公然赞美战争是对人类性格的锻炼和“以剑来保卫天堂”。保尔·莫朗(Paul Morand, 1888 - 1976)的《我焚毁莫斯科》充满了恶意和反苏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战前形成的两种思想之间的斗争变得更为激烈,形成了在意识形态上两个对